

资本主义治理逻辑的历史性考察

——基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

王鸿宇¹, 蓝江²

(1.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 湖南长沙, 410083;

2. 南京大学哲学学院, 江苏南京, 210023)

摘要: 政治经济学不仅是研究国民财富性质和原因的学问, 也是以经济逻辑为基础的政治治理理论。对现代资产阶级社会进行最初理论研究的重商主义从流通领域的交换关系出发把金银货币看作财富的唯一形式, 为了国民财富的增长和国家实力的增强, 主张国家政治治理干预和控制社会经济生活, 试图建构社会存在之“人为秩序”。当政治经济学从重农主义发展到亚当·斯密, 生产领域中劳动的财富价值逐渐得到指认, 自由的生产要求自由的交换与流通, 反映在政治层面为“治理的自然主义”。资产阶级自由主义经济学催生了风险社会, 并不断危及资本主义制度本身。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资本主义治理谱系, 不仅为厘清资本主义治理逻辑的历史嬗变提供了独特的审视路径, 还有助于揭示政治经济学的隐秘治理效应, 进而可以形成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批判。

关键词: 资本主义治理; 重商主义; 重农主义; 自由主义

中图分类号: D082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672-3104(2024)06-0158-10

现代资产阶级治理的实质是以资本为中心的治理, 即“资本”主义治理, 这是由生产关系的资本主义性质所决定的, 因为始终是一定的社会生产力和生产关系发展状况决定着相应的政治国家。这样, “法的关系和国家的形式不能从它们本身来理解, 它们根源于物质的生活关系, 而对这种物质的生活关系的解剖应该到政治经济学中去寻求”^{[1](412)}。从狭义意义上说, 政治经济学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的理论分析, 主要以资本主义生产方式以及与之适应的生产和交换规律为分析对象, 但这并不意味着政治经济学仅仅是经济科学, 实际上它还是政治科学, 只不过是建立在特定经济逻辑基础之上的政治学说。亚当·斯密(Adam Smith)曾在《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以下简称《国富论》)一书中把政治经济学定义为“政治家或立法家的一门科学”^{[2](3)}。忽视政治经济学思想内部深层而又复杂的政治与经济的关系, 极易导致对政治经济学的片面化理解。从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视角考察资本主义的治理谱系, 不仅可以为厘清资本主义治理逻辑的历史嬗变提供独特的审视路径, 还有助于揭示政治经济学的隐秘治理效应, 进而形成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总体性批判。

一、重商主义与“人为秩序”: 资本主义治理的历史探源

作为“对现代生产方式的最初的理论探讨”^{[3](375)}的重商主义(Mercantilism)产生于16世纪封建生

收稿日期: 2023-09-22; 修回日期: 2024-02-14

基金项目: 湖南省哲学社会科学青年项目“历史唯物主义视域下的资本主义治理谱系批判研究”(22YBQ002)

作者简介: 王鸿宇, 男, 内蒙古化德人, 法学博士, 中南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讲师, 主要研究方向: 马克思主义国家学说与社会治理理论, 联系邮箱: whongyu0911@163.com; 蓝江, 男, 湖北荆州人, 南京大学哲学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教育部“长江学者奖励计划”青年学者, 江苏省杰出社科英才, 主要研究方向: 当代欧陆马克思主义和资本主义

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过渡的变革时期或者说资本的原始积累时期,是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幼年时期”的经济学理论,主要反映了这一时期商业资本的利益和要求。正如英国经济思想史学家埃里克·罗尔(Eric Roll)所说:“任何有关重商主义的讨论都必须从分治主义的、封建主义的经济到富强的单一民族国家的商业发展之间的种种变化谈起。”^[4]西欧封建主义在社会组织和经济结构上表现为分裂状态,即封建领地诸侯和贵族各自为政,商业贸易受制于这种多重辖区的管治,难以畅通开展。易言之,西欧封建社会的政治经济完全是地方性的。不过,商业资本的持续发展破坏着这种地方性格局的生存基础,使其不断突破自身界限,即经济的集中必然要求“政治的集中”,要求“各自独立的、几乎只有同盟关系的、各有不同利益、不同法律、不同政府、不同关税的各个地区”结合为“一个拥有统一的政府、统一的法律、统一的民族阶级利益和统一的关税的统一的民族”^{[5](36)}。统一的民族国家的出现与发展反过来又进一步推动了经济活动的开展以及人们对财富的更多关注。简言之,“经济的集中”与“政治的集中”这两种发展紧密联系在一起,而重商主义正是为了适应这两种发展趋势而提出的理论,或者说是近代欧洲政治经济双重集中的自然结果。德国思想家古斯塔夫·冯·施穆勒(Gustav von Schmoller)就认为重商主义的“最核心不过是国家建构(Staatsbildung/state making)——不是狭义上的国家的建构,而是同时构造国家和国民经济”^[6],使国民经济服务于国家强盛。概言之,重商主义是一种关于国民财富增长与国家实力增强的政治经济学,它确立了以民族国家为标尺的新的财富观。

重商主义把贵金属形态的金银货币看作构成一切国家财富的唯一内容,为了增加国家的财富和实力,专注于经济流通领域中的少买多卖,主张国家权力强势介入经济运行过程,力求用行政手段干预和控制货币运动。由此,国家干预构成了重商主义经济理念的重要组成部分,并围绕如何增加贵金属货币而制定国家与社会治理政策,贸易保护、垄断独占、殖民征服、工业扶植、技工限出等管制手段则是主要实施政策。具言之,重商主义专注于流通领域中的少买多卖,特别体现为对外贸易顺差论,聚焦于对外贸易活动给国家经济和实力发展带来促进作用的顺差观念,它在重商主义特定经济话语的形成过程中起了关键作用。重商主义者认为“只有对外贸易顺差带给我国的财富,才会留在我们中间,从而使我国致富”^{[7](84)},因此“必须时时谨记这一原则:在价值上,每年卖给外国人的货物,必须多于我们消费他们的货物”^{[7](4)},这样“最大的问题莫过于进口大于出口”^{[7](21)}。为此,他们提出了实现对外贸易顺差的两大手段——限制输入和奖励输出,实行贸易保护主义和垄断主义,对于凡是能和本国同类型商品形成竞争关系的一切外国商品都一律加以限制;无论何种货物,只要其贸易差额被认为是不利于本国的,都一律加以限制,而凡是有利于获得收支顺差的对外出口都加以全力奖励。

重商主义在经济上的保护主义和垄断主义反映在政治上的“实践论点”必然是要求国家干预,建立“强权政治”^{[8](519-521)}。进言之,由于处于现代国家诞生与崛起时期,在重商主义看来,源于国际贸易的金银财富增长之于国家实力增强异常重要,是事关民族与国家生死存亡之大事。而且重商主义冷峻地以零和博弈眼光看待国际政治经济关系,所以在重商主义时代,“在那些商业上有所进展的国家之间,最常见的现象是:对别国的进步心存疑惧,把所有的贸易国家都看成是自己的对手,总认为别国的繁荣昌盛必然会使本国蒙受不利”^[9]。充满敌意的“贸易的猜忌”心理使重商主义成为“强烈的‘主战派’”,强调战争的必要性和利益所在。反之亦然,发展强大经济的目的就是要成功地推行征服性的外交政策”^[10]。由此可见,重商主义关于财富增长与强权政治的观点从根本上是相互衔接的,“零和博弈”思维模式引导下的对外贸易顺差论隐含着一方有所得必致另一方有所失的国际政治经济竞争话语叙事。在这种情况下,经济活动往往与强权政治深度勾连,“贸易与开拓殖民地相联系,与毫无节制地剥削殖民地相联系,与非公开的战争相联系,与长期濒于战争的状况相联系”^{[8](519)}。战争成为调节政治经济不平衡的普遍方法,如此便形成了政治与经济、财富与战争之间的病态联结。直言之,早期资本主义发展或者说“占主要统治地位的商业资本,到处都代表着一种掠夺制度,它在古代和近代的商业民族中的发展,是和暴力掠夺、海盗行径、绑架奴隶、征服殖民地直接结合在一起

的”^[3](369-370)]。可见,反映商业资本利益与要求的重商主义本质上是“好斗的政治经济学”^[11],重商主义盛行的时代是“海盗式的帝国主义时代”^[8](519)]。

对外的掠夺计划无疑需要内部的实力支撑。重商主义特别重视对本国资源、人口和工业的开发利用,如此便不可避免地使政府开始控制和治理整个国民社会的生活。也就是福柯所说的,西方社会治理开始进入细致入微地规范臣民生命与生产活动的管治时期,“把人口主要看成是生产力,这是重商主义者的看法,或者严格地说,重商主义者有如此观点的条件是:这个人口确实经过规训机制的培训、分配和安排。人口是财富的来源,是生产力,也是规训的配备:所有这些构成了重商主义者的政治思想、计划和实践”^[12](86)]。也就是说,重商主义不仅把人口视为国家的财富和力量的基础,而且要求把人口置于强制性的规训系统之中,以保证这些人在规定的地方按照一定的规定完成规定的目标。具言之,重商主义认为国家应独占本国人口的制造技能,“规定一切职业须有长时间的学徒时期”,此外阻止向外移民,“禁止本国技工或制造业工人到外国执行职业或传授职业,去者若在接警告后仍未归,便没收所有财产并剥夺一切国内财产的继承权”^[2](232-233)]。

而规训人口则意味着治理一切,意味着官僚政治的兴起,于是带来了“遍布各地的机关,即常备军、警察局、官僚机构、教会和法院——这些机关是按照系统的和等级的分工原则建立的——起源于专制君主制时代,当时它充当了新兴资产阶级社会反对封建制度的有力武器”^[13](151)],同时也充当了为资产阶级利益进行社会治理的主要工具,西方现代国家治理正是诞生于这一历史时期。除此以外,在福柯看来,还因为此时正处于“国家的集权化和宗教的分散和异议运动这两个反方向运动潮流的交汇点”^[12](115)],即一方面要破除封建结构,建立领土、治理和殖民意义上的“大国家”,另一个方面则是宗教改革运动致使教会放松了普遍的精神控制。正是在集权与分散的矛盾运动中,“如何接受统治,严格到什么程度,被谁统治,为了什么目的,用什么方法”^[12](115)]等一般意义上的治理的问题域出现了。

为了科学评定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及其治理效应,我们需要将其置于马克思政治经济学的批判语境中。马克思说,“不论财富的社会的形式如何,使用价值总是构成财富的物质的内容”^[14](49)],但重商主义并不把财富的任何物质要素,而是把抽象财富或者说交换价值看作从事一切经济活动的目标和动机,进而将交换价值的固态化存在——金银货币看作财富的唯一形态。显然,重商主义并不了解财富的主体本质,即财富是人的劳动作用于自然物质的对象化产物,而只是紧盯作为财富主体内容之表现形式的交换价值,这导致重商主义根本无法发现剩余价值的真正起源,而错误地认为产品的价格超过生产费用而形成的余额是从产品高于其价值的出售中产生的,或者说余额来源于交换或出售行为中的贵卖,而非生产领域的剩余劳动,进而导致重商主义把世界贸易以及国民经济中与世界贸易直接有关的特殊部门当作财富的唯一真正源泉划分出来。

在马克思看来,货币的整个运动在流动领域内进行的“‘G—W—G’的形式,为贵卖而买,在本来意义的商业资本中表现得最纯粹”^[14](191)],但流通或商品交换并不创造价值,也不生产剩余价值,因而更无法说明货币何以转化为资本,所以只要遵循等价交换原则,商业资本似乎是不可能存在的。因此,“商业资本只能这样来解释:寄生在购买的商品生产者和售卖的商品生产者之间的商人对他们双方进行欺骗”^[14](191)],并且大部分商业利润都是从侵占和欺诈中产生的。这也就解释了在商业资本占主导的现代资本主义发展初期,为什么世界贸易总是与殖民掠夺相联系,总是需要国家权力的介入或者说以强权为基础。

但从更深层次来看,这是因为“当时真正的资产阶级经济领域是商品流通领域”,或者说资本的形式主要处于商业资本阶段,而非产业资本阶段,所以重商主义必然以流通领域的观点来判断资产阶级社会的整个生产过程,必然直接从流通中产生出来的资本形式——商业资本出发,“从流通过程独立化为商业资本运动时呈现出的表面现象出发,因此只是抓住了假象”^[1](553)],混淆了财富与货币以及

货币与资本。

马克思认为,商业资本是“资本本身的最初的自由存在方式”,是“资本的常见的、所谓洪水期前的形态”,它在封建生产方式向现代生产方式变革的资本原始积累时期“产生过压倒一切的影响”^{[13](376)},它的存在和发展构成了资本或者说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一步发展的历史性前提。因此,马克思认为,批判和攻击重商主义是虚构的理论,“不承认它是政治经济学本身的基本前提的野蛮形式,那是错误的”^{[1](554)}。实际上,重商主义本质上是一种“粗浅的现实主义”,它“以粗野而质朴的形式吐露了资产阶级生产的秘密:资产阶级生产受交换价值支配”^{[1](554)}。重商主义致力于国民财富和国家资源所体现出的民族性质,“实际上把资本家阶级的利益和发财致富宣布为国家的最终目的,并宣告资产阶级社会的到来,去替代旧的神圣国家”^{[3](887)}。

由此可见,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看似存在理论逻辑上的“虚构”与“混淆”,但实则是封建生产方式向现代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过渡的必然产物,是资产阶级在原始积累时期利益诉求的具体表达。关键的是,资产阶级重商主义政治经济学“第一次在社会历史观中正视经济生活决定政治,使资产阶级意识形态从中世纪的政治统摄观中挣脱出来”^{[15](45)},从而在经济利益布展之处生发出了一种具有特定时代特征的治理逻辑。虽然这种治理逻辑表现出明显的主观调控性和政治干预性,并试图通过人为的方法实现社会政治经济秩序的重建,但重商主义的“人为性”显然不同于封建社会建立在“人的依赖关系”基础上的权力模式,而是一种建立经济或“物的依赖性”基础上的社会政治经济筹划。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认为重商主义“与其说是经济学说,不如说是对政府治理提出问题的新方法”^{[12](85)},它远甚于一种经济学,它是“一种治理方式”^{[16](8)}。

二、从重农主义到亚当·斯密:“治理的自然主义”

18世纪,法国财政大臣科尔贝尔牺牲农业扶植商业的重商主义政策致使国内不断遭遇财政危机,这直接为新的经济思想的提出提供了社会基础。在此背景下,作为重商主义“对立面”的重农主义(Physiocrats)最先在法国出现了。

法国重农主义学派创始人魁奈的首创性在于批判重商主义的货币财富论,他提出了新的社会财富生产理论。在魁奈看来,货币只不过是贸易中衡量流通货物的价值尺度,是“贸易的工具”,作用仅在于帮助财富流通,因此产品的反复买卖和流通次数的增加只代表货物的转移和费用的增加,并不生产任何财富,“货币的多少,也并不是判断一个国家是否富裕的基准”^{[17](359)}。也就是说,货币并不是国民真正的财富。在此基础上,魁奈进一步指出,“土地是财富的唯一源泉,只有农业能够增加财富”,因为只有农业劳动能够在补偿支出之后获得净收益和“纯产品”^{[17](364)}。与此相应,魁奈把国民划为三个社会阶级,即从事农业活动的生产阶级、由工商业者构成的不生产阶级以及依靠向生产阶级征收地租过活的土地所有者阶级。值得注意的是,在魁奈的经济学话语中,“封建主义是在资产阶级生产的形式上得到再现和说明的”^{[18](23)}。封建土地所有者阶级显然具有资产阶级性质,他们通过地租无偿占有生产阶级的剩余价值,农业生产是以雇佣劳动为基础的租地经营的资本主义农业。

由于没有机器大工业作为理论建构的支援背景,魁奈还无法抛开一定的具体劳动的特殊性,形成“劳动一般”的科学抽象,因而狭隘地把农业劳动看作唯一创造剩余价值的生产劳动,表现出了一定的理论局限。魁奈的进步意义在于,通过批判重商主义的流通领域决定论,把关于剩余价值起源的研究从流通领域转到了生产领域。“真正的现代经济科学,也只是当理论研究从流通过程转向生产过程的时候才开始”^{[3](376)},因此法国重农学派被马克思称为“现代经济学的真正鼻祖”^{[18](15)}。政治经济学“只是通过重农学派才变成一门特殊的科学,并且从那时起它才被作为一门科学加以探讨”^[19],这为分析资本主义生产以及建基于其上的治理逻辑奠定了基础。

马克思指出,重农学派的巨大功绩是把生产的资产阶级形式“看成社会的生理形式,即从生产本身的自然必然性产生的,不以意志、政策等等为转移的形式”^{[18](15)}。也就是说,重农主义第一次肯定了在社会中存在着不以人的意志和人为治理政策为转移的客观规律,从而为政治经济学提出了认识客观规律的科学任务。自然秩序是重农主义整个政治经济学体系的逻辑基础。在魁奈看来,农业生产是一种符合自然必然性的过程,具有自身的客观规律,因此对人类最有利的秩序不是由于干预介入而得到的人为秩序,而是由神创造的、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秩序:“所有的人,以及一切人类的权力,都必须遵守这个由神所制定的最高规律;这些规律是坚定不移的,不可破坏的,而且一般说来是最优良的,因此可以作为最完善统治的基本规律。”^{[17](333)}就国家治理的主要原则而言,魁奈在《农业国经济治理的一般准则》中给出了具体建议:“国民明显的应该接受构成最完善的管理的自然秩序一般的指导”^{[17](364)};必须使所有的私人利益集中在“农业繁荣”上;为了农业的繁荣,“要修复道路、畅通运河和江海的航行”^{[17](368)};“经济的管理只应鼓励生产的支出和本国农产品的贸易,对于不生产的支出则可任其自流”^{[17](366)},“必须维持商业的完全自由”^{[17](370)};对于有志于行政职务的人和政治家来说,“只研究人为的法律学是很不够的,必须对构成社会的人们最有利的自然秩序进行研究”^{[17](364)};等等。不难发现,重农主义立足于经济的“自然性”提出了一种与重商主义“人为秩序”截然相反的全新的社会治理逻辑。它主张根据经济运动本身的客观过程进行治理,治理的重心也不再是强力介入,而是创造便利条件、刺激,然后放任,从而形成一种“自然秩序”。重农学派的重要成员杜邦·德·奈穆尔在1767年编辑出版了题为《菲西奥克拉特,或最有利于人类的治理的自然体系》(*Physiocratie, Ou Constitution Naturelle du Gouvernement le Plus Avantageux au Genre Humain*)的魁奈著作选集,提出了以由希腊文的“自然”和“治理”两词构成的词汇作为他们理论体系的名称,并将之明确地称为“自然秩序的科学”。可见,重农主义理论体系不仅是一门特殊的现代经济科学,而且还是“与政治经济学相关联的政治哲学”^[20],并且这种政治哲学会把我们“引向现当代治理术的一些根本性路线上去”^{[12](463)}。

概要地说,重农主义的突出理论贡献有两点:一是反对重商主义的流通决定论,把关于财富来源的研究转到了直接生产领域;二是反对重商主义的人为秩序,肯定了在社会中存在着客观规律或“自然秩序”。因此,从经济学说史的角度来看,重农主义具有举足轻重的地位,从资产阶级政治治理逻辑的演进来看,重农主义的重要地位同样不容忽视。

在生产和治理或经济与政治这两个要点上,斯密继承了重农学派的遗产。不同的是,魁奈以“自然赐予”为前提,看到的仅是农业生产以及由外在于人的神所创造的“自然秩序”;而斯密则以社会分工为支点,不仅推出了形成社会财富的“劳动一般”,而且还第一次在内在于人的经济活动中发现了人类社会的客观规律。毋庸置疑,分工与交换是《国富论》中的两个基础性概念,它们奠定了斯密经济哲学方法中社会性维度的基本层次。^[21]根据斯密的观点,人类相互交换的一般倾向造成了社会分工:“分工一经完全确立,一个人自己劳动的生产物便只能满足自己欲望的极小部分。他的大部分欲望,须用自己消费不了的剩余劳动生产物,交换自己所需要的别人劳动生产物的剩余部分来满足。于是,一切人都要依赖交换而生活,或者说,在一定程度上,一切人都成为了商人,而社会本身,严格地说,也成为了商业社会。”^[22]商业社会普遍的社会分工和商品交换关系使斯密认识到,不论是农业劳动,还是工业和商业劳动,都在社会经济关系总体之中占有一席之地,都是为满足他人需要付出的劳动,因此必须抛开劳动在形式上的特殊性,在内容和本质层面把它们都归为创造物质财富的“劳动一般”,这就为后来建立劳动价值论打开了空间。从现实劳动的特殊形式过渡到劳动一般的抽象规定,斯密在生产方面实现了对魁奈理论的深化与超越。

社会分工的观点使斯密在生产方面极大地深化了重农学派,在治理哲学建构方面也有重大推进。在斯密看来,一切人都依赖于交换的社会生活,这使一切人都成了商人,“商人”的利己主义使得人

们在资源稀少情况下不断地进行生产劳动,以期通过向其他人提供劳动产品而获得自身所需产品,最后在市场需求的自发调节下,形成市民社会的总体需要。市民社会中的每个人虽然既不算增进公共利益,也不知道自己在何种程度上增进了这种利益,每个人都只是盘算和追逐着自身的安全和利益,但是“在这种场合,像在其他许多场合一样,他受一只看不见的手的指导,去尽力达到一个并非他本意想要达到的目的。也并不因为事非出于本意,就对社会有害。他追求自己的利益,往往使他能比在真正出于本意的情况下更有效地促进社会的利益”^{[2](30)}。也就是说,在自由竞争中,个人考虑的虽然是其自身的利益而不是社会利益,但个人对自身利益的考虑却必然会引导其选定最有利于社会的选择,从而实现自身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自然的一致。也就是说,无须对人进行干预,只要树立自由制度,便可以实现个人利益和社会利益的调和,进而达成社会治理的目的。因此个人只要不违反法律法规,便应该完全听其自由,让他自由地追求自己的利益。通过“看不见的手”,经济活动可以促进秩序,从而有利于社会治理。由此可见,正是在利己主义的交换关系中形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的经济关系总体,并在不断的交换过程中自发地形成了资产阶级社会经济运动的客观法则。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便是对这种自发性的社会经济运动客观法则的比喻。放置在哲学历史观的逻辑层面来看,这个比喻第一次在内在于人的现代经济活动过程中肯定了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社会经济结构和客观规律。在此基础上,进一步导引出了资产阶级社会的治理原则,即以资产阶级自由市场经济自然性和公正性实现资产阶级社会的所谓的天然性和永恒性的治理目的。^{[15](55)}

需要再次指出的是,虽然魁奈和斯密皆强调社会治理中不以人的意志为转移的自然秩序和客观规律,但两者存在一定差别。在魁奈那里,自然秩序完全是由自然界或神所规定的,它按照外在于人的自然规律运行,因而是一种外在于人的先在性的客观秩序。斯密则完全不同,他是根据人自身的社会经济活动内生出发的运动规律来论证自然秩序的,因而在斯密这里,自然秩序是一种内在于人自身的客观秩序。总之,在魁奈和斯密那里,存在着两种不同客观性:一种是外在的“听天由命”式的客观,一种是内在的“由人创造”的客观。正是后一种客观真正地确立了现代资产阶级社会以经济“自然性”为中心的治理技术。因此,可以说斯密不仅成功地把财富的本质由原来的外在对象转到内在劳动中,实现了对财富本质的科学界定,而且还把“自然秩序”从外在自然转到内在经济中。所以斯密不仅是“国民经济学的路德”^[23],而且在资产阶级治理哲学中理应也摘得同样的“桂冠”。

造成魁奈和斯密在论证和阐释“客观秩序”上的差异的主要原因是资产阶级社会经济在两者所处的历史时期的发展程度不同,而坚持和强调资产阶级社会市场经济的自由放任原则则是两者一脉相承的地方。在福柯看来,从重农主义到斯密,形成了一种无论是在机制上、效果上还是原理上都是新式的治理技艺,一种“治理的自然主义”。这种新式治理技艺的真理化基础是资本主义自由市场,或者说资本主义自由市场建构了一个证实/证伪治理实践之真言化场所:“正是市场的自然机制和所形成的自然价格——当人们基于此去观察治理的所作所为,治理所采取的措施,治理所规定的规则之时——可以使我们的证实或证伪治理实践。”^{[16](43)}也就是说,借助于自由市场的自然机制或者说资本主义经济运行的内在规律,资产阶级社会建构起了一种“尽可能少地来治理的技艺”,反对人为过多地对经济和社会发展过程的干预,主张通过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自发性运行达成社会“善治”之政治目的。可见,建基于资本主义自由市场自然机制之上的“尽可能少地来治理的技艺”所带来的个体自由,并不是通过尊重个人的自由而是通过遵守经济学分析的明证性,即通过对市场和经济流通中的客观规律的认识实现的。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说“这种新的治理技艺的特征更多的是自然主义,而不仅是自由主义”^{[16](78)}。当然,相较于重商主义的“人为秩序”,在“治理的自然主义”中,“自由”开始处于治理实践的核心,因此我们亦可直接将这种新的治理技艺称为自由主义的治理技艺。

总的来说,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治理技艺建立在自由主义经济学或者说自由主义经济学对市场自然机制的发现的发现的基础上,其中政治自由主义建基于经济自由主义之上,或者说经济自由引向个体自由。

当然,作为资产阶级社会治理根基的市场自然机制绝非天然存在,只不过是人类社会特定历史阶段的物质规律,是资本主义特定经济运行中所生发出来的一种似自然性或伪自然性,其内部存在着无法克服的矛盾。

三、风险社会与安全机制:自由主义经济学治理效应的内在悖论

魁奈的“自然秩序”和斯密的“看不见的手”的思维观念显然是一种不同于宗教神学的经济理性之意识形态表达。随着经济理性的确立以及人们对市场自然调节机制的认同,未来可以被理性预测并掌握的思想观念也随之应运而生。“现代经济以市场中立的观念为支点,是为了强调现代人已经意识到了风险的必然性,这就涉及到对安全问题的考虑。因为意识到未来不是由外部权威决定的,因此人们把目光投向控制未来并使之具有可预测性。”^[24]德国社会学家卢曼就把对内部决定的可能缺陷的归因定义为风险,而把对外部决定之缺陷的归因称为危险。^[25]因此,与“治理的自然主义”相伴而生的是风险观念与安全机制。

我们已经知道,“治理的自然主义”是通过自发的经济调节机制进行治理,或者说使自然性调节成为治理运作的基本机制,而自发性的经济调节机制本身在现实社会生活中难免会遭遇到人为的干预和破坏,因此为了使经济自发性治理机制能够自行其是并畅行无阻,国家治理机关就必须制定一定的保护框架,以免被一些随意的、盲目的干预所扰动。也就是说,必须设置安全机制,其主要功能和根本目标是保障经济自然调节和资本主义国家的平稳运行。

由此可见,资本主义自由主义的治理技艺或者说“治理的自然主义”虽然强调资本主义国家或社会治理实践必须遵从经济的自然过程,随着自发性经济活动一起运转,但并不是说政治治理完全无为、绝对不干预,彻底遵从经济的自然性。这是因为自由主义治理技术只能在存在某些自由的前提下才能运转,譬如交换的自由、贸易的自由、使用财富的自由等。也就是说,自由主义治理技艺为了进行治理就必须首先人为构造出自由权利,成为自由权利的管理者,产生出自由所凭借的条件和环境。换言之,政治治理需要架构并维持自然性得以自由运作的条件和环境。需要注意的是,对运作条件和环境的建构与维持并不意味着资本主义治理回向了重商主义的“人为秩序”。就主要治理逻辑而言,自由主义的治理技艺对社会秩序的建构总体上是通过自然性或者说经济机制的自发运动而确立的,而且过去发挥重要作用的重商主义的人为性现已不再是主要的治理逻辑,它只是作为一种辅助性治理技术存在,只有在自然性治理出现某些混乱状况时才会介入。

进而言之,资本主义治理表现为一种主从复合逻辑:一种是自然性的逻辑,它通过自由主义市场经济的自然调节机制发挥社会治理效应,而另一种则是人为性的逻辑,通过某种强制手段保障和维持自然性治理逻辑,使自然性治理逻辑运作过程中出现的混乱、错误、非法活动能够得到及时的阻止或镇压。换言之,一方面是激励/调节机制,另一方面是阻止/镇压机制。因此,我们发现这种自由主义治理实践的核心处存在着一种动态的复杂关系:一方面主动产生出自由,另一方面这种自由的产生又需要立法和干预的保障,这也就意味着在产生自由的同时又具有限制和摧毁自由的风险。正是在这个意义上,福柯指出:自由主义在安全机制中运作,“这个机制每时每刻都要围绕着这个风险概念来评判个人的自由和安全……自由主义是一种从根本上操纵利益的一种治理技艺,那么,它就不能——这就是纪念章的另一面——在操纵利益的同时不成为风险的管理者和安全/自由机制、安全/自由游戏的管理者”^{[16](84)}。也就是说,在福柯看来,资本主义现代性的权力治理机制是由一种张力关系构成的,这种张力关系存在于参与风险的需要和避免危机的发生之间。质言之,在自由主义治理技艺的核心处暗含着“自由的生产/毁灭的关系”,一种自由与安全间的辩证关系,一种资本主义治理领域内的辩证法,同时也是自由主义经济学治理效应的内在悖论。

自由和安全之间的张力关系塑造着资本主义制度下人的现代生活体验,即个人永久地处于风险境遇之中,或者说他们被规定着去感受现在及将来充满着不确定的日常生活。在福柯看来,“风险在某种程度上是自由主义的成立条件、心理关联项和内在文化,没有关于风险的文化,就没有自由主义”,自由主义的信条就是“危险地活着”^[16](84-85)]。这正是马克思、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所指出的:资产阶级时代不同于过去一切时代的地方就在于“一切等级的和固定的东西都烟消云散了”,“生产的不断变革,一切社会状况不停的动荡,永远的不安定和变动”^[5](34-35)]。齐格蒙特·鲍曼把现代社会不安定和变动的境况指认为“流动的現代性”,即“一种让每个人向前移动都充满难以计算的风险的状态”^[26]。德国著名的社会学家乌尔里希·贝克直接把现代社会定义为“风险社会”,并表达了担忧:“风险社会是一个灾难社会。在这样的社会里,例外状态恐怕也要成为常态了。”^[27]贝克曾经的担忧得到了当代哲学家阿甘本的回答:“例外状态似乎愈来愈成为当代政治最主要的治理典范”^[28]。

安全与自由的辩证关系不仅塑造着自由主义治理技艺的权力结构与现代人的生活体验,而且还不断地否定着资本主义治理,最终使其产生“治理术的危机”并崩溃瓦解。^[16](82-87)]资本主义治理的危机与经济危机是联系在一起的,就其本质而言,这是由资本的矛盾性质决定的,资本主义治理本质上是资本逻辑的保障机制,旨在避免危机并为资本的充分运行提供条件。自由与安全、重商主义与重农主义治理逻辑之间的辩证运动从根本上从属于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与政治、市场与国家之间的辩证运动,它们共同随着资本逻辑的发展而变化,处于此消彼长、循环往复的运动之中。英国著名经济史学家卡尔·波兰尼形象地把资本主义制度下的经济与政治的辩证运动称为“嵌入运动”(disembedding movement)。在波兰尼看来,19世纪前,经济一直都嵌入在社会和政治之中,现代资产阶级社会强调市场的自发性调节作用,要求社会和政治的运转嵌入经济逻辑之中。自由放任的经济运动的脱嵌倾向又需要社会和政治的保护性反向运动来加以平衡并阻止灾难。“由市场释放出来的张力就这样在市场和和其他的主要制度领域之间来回运动。每个领域都对其他领域有相对独立性,都倾向于达到自身的平衡,而一旦这种平衡没能达成,失衡就会向其他领域扩展。正是各领域的相对自治造成了张力的累积,这种累积进一步导致紧张最终也多少有点老套的形式爆发出来”^[29]。20世纪30年代,自由竞争导致资本主义世界出现通货紧缩,以美国为主要代表的资本主义国家求助于凯恩斯的国家干预主义,并试图通过提高政治对经济活动的介入性来克服危机。虽然凯恩斯主义使美国避免了经济大崩溃,走出了危机,但它同时也助长了国家资本主义。在20世纪70年代,政治力量的过度介入不仅使政府治理机构臃肿、行政效率低下,而且使经济陷入停滞,凯恩斯主义失效了。与此同时,随着一系列强调自由化、私有化以及全球化的政策的全面展开,新自由主义成为主流,政治治理再次收缩并从属于市场经济逻辑。然而,新自由主义虽然通过经济领域的自由竞争开创了新的稳定的社会治理样态,但它目前又呈现出迈向垄断控制并与政治权力勾连的强烈倾向。可见,即使是在自由主义治理原则占主导的现代,重商主义也未曾完全退出过历史舞台,它在现代政治经济理论和实践方面总是不断地得到回响和践行——新李斯特学派、罗斯福新政、凯恩斯主义等。^[30]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与政治之间的“嵌入运动”不仅促使着资本主义社会从自由竞争的资本主义向垄断或组织化资本主义,再向新自由主义的资本主义转型,而且也必然导致资本主义社会的最终瓦解,而资本主义的内在矛盾及其经济危机正是这种“嵌入运动”逻辑的转折点和最终消灭者。

在马克思看来,“资本主义的管理就其内容来说是二重的,——因为它所管理的生产过程本身具有二重性:一方面是制造产品的社会劳动过程,另一方面是资本的价值增值过程”^[14](385)]。这是因为资本按照自己的逐利本性来说,要求社会生产力只能在一个有局限性的范围内发展,但这种界限和资本要无限度地扩大劳动和价值创造的趋势相矛盾。换言之,在资本主义社会中,社会的物质生产力被限制在一个有限的社会生产关系基础上发展,政治正是维护这种有限的社会生产关系的主要手段之一。但资本主义社会中的经济不仅是资本的特殊力量,同时也是社会物质生产力的一般发展,其发展

趋势与资本主义生产借以实现的社会关系相矛盾,由此形成了资本主义社会中政治与经济间的结构性张力。也就是说,生产力的绝对发展与生产力的资本限制之间存在矛盾,“资本一方面确立它所特有的界限,另一方面又驱使生产超出任何界限,所以资本是一个活生生的矛盾”^[31]。整个资本主义治理都是在矛盾中运动的,都在政治与经济或者说经济的自然性与政治的人为性治理力量之间此消彼长地摇摆运动。矛盾不断地被克服,又不断地被生产出来,政治权力不断地介入,又不断地被要求缩减,但矛盾越发展越尖锐,一旦遭遇自身难以突破的界限,政治便再也无法将经济嵌入其中,从而直接威胁到资本主义制度本身。

四、结语

“只要政治经济学是资产阶级的政治经济学,就是说,只要把资本主义制度不是看作历史上过渡的发展阶段,而是看作社会生产的绝对的最后的形式”^{[14][16]},它就不是真正的科学,而是一种意识形态,甚至是一种治理技术,即表面标榜所谓“价值中立”的“纯科学”,实则是一种从资产阶级立场出发开展经济活动并辅之以相应的政治介入的现代治理范式。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是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性超越,《资本论》的副标题“政治经济学批判”清楚地表明了这一点,它不仅对作为“副本”的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进行了批判,而且对“原本”即资本主义生产方式进行了批判,揭示出了资本主义本身的历史局限性与终结必然性。^[32]当然,对资产阶级政治经济学的批判并不否认资本的文明面向,“资本的文明面之一是,它榨取这种剩余劳动的方式和条件,同以前的奴隶制、农奴制等形式相比,都更有利于生产力的发展,有利于社会关系的发展,有利于更高级的新形态的各种要素的创造”^{[3](927-928)}。新时代马克思主义政治经济学必须始终坚持人民立场,必须深化对资本性质、资本作用、资本规律的认识与研究,不断提高治理资本运行的能力,科学设立资本“红绿灯”,不断探索规范和引导资本健康发展的方针政策,促进各类资本良性发展、共同发展,发挥其作为重要生产要素在发展生产力、创造社会财富、增进人民福祉等方面的积极作用,进而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同时为当前百年未有之大变局下的资本治理与全球治理贡献中国智慧与中国方案。

参考文献:

- [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8.
- [2] 斯密.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下卷[M].郭大力,王亚南,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3] 资本论: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4] ROLL E. A history of economic thought[M]. London: Faber & Faber, 1992: 42.
- [5]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6] 施穆勒.重商主义制度及其历史意义[M].严鹏,译注.上海:东方出版中心有限公司,2023: 100.
- [7] 孟.英国得自对外贸易的财富[M].袁南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65.
- [8] 熊彼特.经济分析史:第1卷[M].朱泱,等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 [9] 休谟.休谟经济论文选[M].陈玮,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74.
- [10] 安德森.绝对主义国家的系谱[M].刘北成,龚晓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6: 16.
- [11] MAGNUSSON L. The political economy of Mercantilism[M]. New York: Routledge, 2015: X.
- [12] 福柯.安全、领土与人口[M].钱翰,陈晓径,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 [1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
- [14] 资本论:第1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8.
- [15] 张一兵.回到马克思:经济学语境中的哲学话语[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14.
- [16] 福柯.生命政治的诞生[M].莫伟民,赵伟,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8.
- [17] 魁奈经济著作选集[M].吴斐丹,张草纫,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7.

- [18]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4.
- [19]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60: 483.
- [20] 博纳. 哲学与政治经济学: 历史关系的考察[M]. 张东辉, 夏国军,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21: 149.
- [21] 唐正东. 从斯密到马克思: 经济哲学方法的历史性诠释[M]. 南京: 江苏人民出版社, 2009: 52.
- [22] 斯密. 国民财富的性质和原因的研究: 上卷[M]. 郭大力, 王亚南, 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7: 23.
- [23] 马克思恩格斯文集: 第1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2009: 178.
- [24] 科宁斯. 从哈耶克到特朗普: 新自由主义民主的逻辑[J]. 国外社会科学前沿, 2019(7): 14–26.
- [25] 卢曼. 风险社会学[M]. 孙一洲, 译. 南宁: 广西人民出版社, 2020: 43.
- [26] 鲍曼. 流动的现代性[M]. 欧阳景根, 译. 上海: 上海三联书店, 2002: 30.
- [27] 贝克. 风险社会: 新的现代性之路[M]. 张文杰, 何博闻, 译. 南京: 译林出版社, 2018: 10.
- [28] 阿甘本. 例外状态[M]. 薛熙平, 译. 西安: 西北大学出版社, 2015: 5.
- [29] 波兰尼. 大转型: 我们时代的政治与经济起源[M]. 冯钢, 刘阳, 译. 北京: 当代世界出版社, 2020: 216.
- [30] 王高望, 刘吕科. 重商主义发展的三阶段论[J]. 制度经济学研究, 2017(1): 30–43.
- [31] 马克思恩格斯全集: 第30卷[M]. 北京: 人民出版社, 1995: 405.
- [32] 李逢铃. 意识形态批判还是政治经济学批判? ——重审马克思商品拜物教批判的理论定位[J]. 中南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 2022, 28(6): 154–161.

Historical examination of the governance logic of capitalism: Based on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ics

WANG Hongyu¹, LAN Jiang²

(1. School of Marxism, Central South University, Changsha 410083, China;

2. School of Philosophy, Nanjing University, Nanjing 210023, China)

Abstract: Political Economics is not merely a discipline of studying the nature and causes of national wealth, but also a theory of political governance based on economic logic. Mercantilism, the initial theoretical study of modern bourgeois society, starts from the exchange relations in the circulation field, regarding gold and silver currencies as the sole form of wealth. To boost national wealth and to enhance state power, it advocates state intervention in political governance and control of social economic life, attempting to construct the "artificial order" of social existence. As political economics evolves from mercantilism to Adam Smith, the wealth value of labor in the production sector is gradually recognized. Free production requires free exchange and circulation, which is reflected politically as "naturalistic governance." Bourgeois liberal economics gave impetus to the risk society, and continuously endangered the capitalist system itself. Examining the lineage of capitalist governance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Marxist political economy not only provides a unique scrutiny path for clarifying the historical changes in the logic of capitalist governance but also helps reveal the hidden governance effects of political economy, ultimately achieving a comprehensive critique of bourgeois political economy.

Key words: capitalist governance; mercantilism; physiocracy; liberalism

[编辑: 郑伟]